

陈荣昌○著 周立英○点校

「乙巳东游日记」点校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陈荣昌○著

周立英○点校

〔乙巳东游日记〕点校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乙巳东游日记》点校 / 陈荣昌著; 周立英点校.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80695-554-3

I. 乙… II. ①陈…②周… III. 日记—作品集—中国—近代 IV. I2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2458 号

责任编辑: 黄显松 张 林

责任校对: 李 林

封面设计: 庞 宇

乙巳东游日记

陈荣昌 著 周立英 点校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云南美术出版社

印 制: 云南朗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30 千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95-554-3

定 价: 15.00 元



作者简介：

周立英，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民族史、云南地方史研究，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多次荣获院、校、省级奖励，其中《从云南看近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女学的产生及其影响》一文获云南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

内容简介：

1905年，时任云南高等学堂学务视察员的陈荣昌远赴日本考察学务，作《乙巳东游日记》一书，连续记录了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七日他每天在日本考察的内容、游踪及其观感，具体包括实业考察、学务考察、军事考察、与日本政界、教育界、企业界官员的联系及往来、他在日本游览的行踪及与云南留日学生的交往，等等。全书约11万字，除正文日记部分外，另有两个附录。

该书提供了大量晚清时期云南留日学界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这一时期云南的社会变迁、中国边疆官吏和云南地方政府对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态度与看法、云南留日学生及陈荣昌个人思想认识的转变等问题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

前 言

甲午战后，中国国势之孱弱暴露无遗。怀抱救国救民的思想，大批中国青年留学日本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人文知识，东渡考察日本成功经验的有识之士络绎不绝。光绪三十一年（1905），云南地方官府派在籍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前昆明经正书院山长、时任云南高等学堂学务视察员的陈荣昌远赴日本考察学务，使其成为近代云南官绅赴日考察的第一人^①。陈荣昌考察了日本四岛中的北海道、本岛、九州三岛，是第一个到北海道师范学堂考察的外国人；他所到之处备受关照，军工厂、陆军士官学校、陆军中央幼年学校等几乎不对外开放的地方，而他有幸一览；日本文部听讲^②先前仅给吴挚甫一人举办过，陈荣昌是获此特殊礼遇的第二个中国人；其考察范围之广，所受待遇之高，考察之深入，在晚清中国边疆官吏中实为少见。陈荣昌是一位有社会责任心和宏图远志的官员。与利用公帑到日本游山玩水，寻欢作乐的清朝大员不同，他每到一处必认真学习，虚心求教，详细笔录，从日本考察归来，即整理刊行《乙巳东游日记》（以下简称《日记》）

① 据目前检索的资料可知，陈荣昌有可能是晚清云南省派出的惟一名专职学务考察员。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云南省就有大批官绅赴日本考察学务，但均兼习师范，直至宣统三年（1911），这一情况一直没有改变。

② 文部听讲 即由日本文部省组织，面向来日考察的外国人举办的学术交流，多由日本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或政要担任主讲。

一书，将自己在日本考察所见所闻所得向国人报告。《日记》保存了当时日本社会、文化、教育、经济、政治诸方面的宝贵资料和见闻实录，是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和当时中国人走出国门，向日本学习的珍贵史料。一百多年来，《日记》流传民间，版本众多，讹误不少，且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不仅时人所作书中对《日记》几乎无所提及，如袁嘉谷著《袁嘉谷文集》^①、陈荣昌著《虚斋文集》^②、陈荣昌总纂《（民国）昆明县志》、《续修昆明县志》等，且今人研究成果中也较少介绍、利用该书，如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撰《云南省志》卷六十“教育志”^③。2004年，由王宝平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晚清东游日记汇编”系列未完整见到，仅见的几部中均未收录《日记》，不知未见的几部中是否有所收录。为使这部具有重要价值的珍贵史料不致湮没，为读者提供一部好的参考书，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在云南省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的支持和帮助下，笔者对陈荣昌的《日记》作了校对、注释，希望能对学术界研究晚清中国，特别是云南与日本文化交流史有所裨益。

① 袁嘉谷：《袁嘉谷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陈荣昌：《虚斋文集》，昆明：明夷村舍，民国七年（1918）。

③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志·教育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一 陈荣昌与《日记》

陈荣昌（1860～1935），字小圃或筱圃，号虚斋，晚号困叟、桐村，云南府昆明县人，教育家、书法家。清光绪九年（1883）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贵州学政、国史馆协修、昆明经正书院山长、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等职。光绪三十一年（1905），派赴日本考察学务。第二年任贵州提学使，奏参贵州巡抚兴禄在滇总办洋务时派夫修路、划界失地罪状，名闻中外。后丁母忧离职回滇，历任滇蜀腾越公司总办、云南自治筹备处总办、学务公所议长、云南教育总会会长。宣统三年（1911），服满入京，被选为资政院议员，旋授山东提学使。1912年回滇隐居，以卖字自给，曾任云南国学专修馆馆长，《云南丛书》名誉总纂。有多部纂述存世。^①

《日记》的成书与近代中国的留学日本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掀起了一股留学日本的狂潮，旨在向日本学习西学，重振国威。为响应清廷留学兴国政策的号召，云南也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派出了首批留日学生。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已达百数十人之多。这些留日学生来到日本后，目睹日本社会日新月

^① 《云南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云南辞典》第649页“陈荣昌”条将“光绪三十一年（1905），派赴日本考察学务”误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版）。郭思九等编：《云南文化艺术辞典·书法》第1120页“陈荣昌”条，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版。

异，国家欣欣向荣，深感日本教育改革有成，心想桑梓破败不堪，技不如人，于是纷纷邀请滇督大吏赴日本考察学务。他们认为实地考察可以“开辟我知识，鎗启我锢蔽，鼓铸我精神，以引我于可忧可泣、可羨可慕、可喜可贺之域”，^①希望滇吏能将日本的改革引入云南，以振兴桑梓，壮大国威。他们联名请云南留日学生监督袁嘉谷拟具书信，寄回云南。书信情真意切，使人“开缄读罢泪盈腮”^②。感怀于留东学生的爱国爱乡之情，在滇吏积极寻求救滇以救中国的良策之际，光绪三十一年陈荣昌以“滇硕望”的身份，及“念吾滇危弱，幅员界两大（按：即英国和法国）间，岌岌如累卵，思所以补救之”的爱国热情当选学务考察员，“应在东乡人之请”，满怀“飞腾之志”，被派赴日本考察学务。他与进士钱鸿逵于1905年三月起程赴日本考察学务，并送生徒十余人前往日本留学。

中国官绅自1866年斌椿起，就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即凡经历外国，多将其见闻观感写入日记，或赋诗吟咏，以为记录。陈荣昌亦不例外。在日本考察的三个月内，在担任翻译的云南留日学生钱良骏、李培元等人陪同下，陈荣昌参观了瀛洲三岛的政治、教育、实业、军事诸規制，并将其游踪、观感写成日记，在留日同乡的劝说下付梓刊印，题书名为《乙巳东游日记》。希望此举能将充

①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序文》。以下引自该《日记》者，不再注明出处。

② 陈荣昌：《虚斋诗稿》（木刻6册）卷10《东游集》第1页。

满“激发愧励之思”的东游日记“托蓬瀛蚕纸，化身千亿，流播乡里”，“爽然破前此之酣梦”，使云南“人人开辟其知识，鎗启其锢蔽，鼓铸其精神，策群力以兴实业，讲实学”，集全省之力以为力，从而达到“振兴国势，恢张国力”的目的。《日记》于光绪三十一年、三十二年分别在东京和云南印行。

二 《日记》的主要内容

《日记》体例为日记体，连续记录了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七日陈氏每天在东瀛考察的内容、游踪及其观感。全书约十一万字，一册。除正文日记部分外，另有两个附录：一为日本人小川资源著、昆明留日学生钱良骏译《中华铁路小言》一文，一为日本文部省参事官田所美治述，剑川留日学生周钟岳译《学制大意》六篇，均为陈氏考察学务期间与日本人的交流所得。具体而言，《日记》内容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 实业考察。陈氏抵日之初，适逢学校暑假休业，考察未便，所以先从实业开始考察。他“循足尾，越青森，渡津轻峡，历北海道，经札幌，详考农、矿、森林、牧畜诸实业”，考察了岛津电机制造所、织物株式会社、新宿自来水工场、三越吴服店、勤工场、足尾矿业所、北海道制麻株式会社、札幌农学校、种畜场、浪花电话交换局、印刷局、卫生试验所、硝子株式会社、电气株式会社、中央气象台、瓦斯陈列场、王子造纸厂、制绒会社、赤十字社、警视厅、寺尾制作所、筑地印刷所等机构，分

别记录了这些机构的创始人、资本、创办历史、男女工人数量及其文化程度、主要功能、制作程序、运营情况等。大多数机构记载详细，令陈氏感到新奇的事物记载尤详。^①

2. 学务考察。考察了大部分实业机构后，陈氏返回东京，各学校次第开学，他便开始考察学务。他先后参观考察了长崎县师范学校、北海道师范学堂、养育院、感化院、高等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校、第一高等女学校、常磐小学校、滨町小学校、有马小学校、东京府女子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幼稚园、盲哑学校、东京府中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实践女学校、女子工艺学校、共立女子职业学校、学习院、女子大学校、三轮田高等女学校、华族女学校、鲛桥小学校、帝国大学校等校，以及文部省、东京府教育会、教育博物院、帝国图书馆等教育机构，分别记录了这些学校的创办者、创办历史、学制、学费、师资队伍、学生来源及师生上课、游戏的情况和教育机构的相关情况。考察学务是陈氏此行的主要目的，因此这方面的考察陈氏尤为仔细。除了参观上述各学校、机构外，陈氏还与日本政界、教育界名人论学，如“与大隈伯辩旧学，志伊泽氏言创学，与石僧言官制、衣冠，与竹添言教科编制”，听嘉纳治五郎言日本维新后之学校、佐佐木吉三郎讲小学校颠末，又听医学博士绪方正规讲卫生学和医学、子爵田中不二麻吕讲学校办法。此外，文部省和宏文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还分别为陈氏一行安排了几次专题讲课，

^① 如岛津电机制造所、礼晃农学校等。

内容有学校制度、小学校沿革、中学校之制、高等女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大学、实业教育、人类学、社会学、铁路事宜、国家学、法律学，等等，涉及教育、实业、社会、法律诸领域。其中，“人类学取生存竞争，社会学取群聚固结，凡此皆有关于当世改革兴创之要务，记尤加详”。六次文部听讲的内容也有详细记录。同时，陈氏还积极联系聘请日本教习事，最后确定了江部淳夫、池田太郎等人到云南高等学堂所属优级师范和法政学堂分别担任各科教习，并正式签订了合同。

3. 其他考察及游踪。①军事考察。军事方面日方尤为谨慎，仅让陈氏参观了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士官学校和炮兵工厂，且参观多停留于表面。②与日本政界、教育界、企业界官员的联系及往来。如大隈重信，伯爵，早稻田专门学校创办者，曾为日本外相议事，被其反对者炸断右足而“任事益勇，持议益坚”，“其谋国长于理财，又以排外为主义”。其数千弟子中有一百多人下为下议院议员，后大隈虽谢政，仍居上议院参议国事。他曾建议陈氏，中国兴学当扫除旧学中的糟粕，全面推行新学，且“兴学当以国家主义、国民教育为宗旨”。又如长冈护美，子爵，竭力为陈氏一行介绍文部听讲话宜，联系聘请日本教习事，且招饮陈氏于家，请陈氏为其院中鱼池取名为“跃鲤池”。又如伊泽修二，“于日本兴办学务经历最久”，为陈氏详细解答了“兴办学校次第当如何”、“办学之初当如何筹款”两大难题。又如嘉纳治五郎，宏文学院创办人及校长、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协助陈氏聘请日本教习，并介绍岳父井井先生与陈氏认识。井井先生“经

学不宜入小学科目中”的建议，引起陈氏对中小学教学内容改革的思考。又如得能通昌，印刷局局长，建议陈氏考察学务不应只到一国，否则，“所考察者无从比较，安知其孰优孰劣而弃短取长乎？故游日本当更游欧美乃有益”。并在家宴请陈氏，同席者中有嗜汉学者高田忠周，出所著书十余卷示陈氏，陈氏题诗以赠之。此外，陈氏也几次宴请以上诸位，并相互咏诗以赠。值得一提的是，陈氏和常陪他参观考察的云南留日学生监督袁嘉谷在与日本政、教、军界人物交往过程中，以诗会友，互赠诗歌，成为近代最早用诗歌进行中日文化交流的云南人士。^① ③陈氏在日本游览的行踪及与云南留日学生的交往。陈氏到日本后，先后游览了諏访公园、东山黑谷银阁寺、南禅寺、青莲院、智恩院、卧龙梅、丸山公园、日比谷公园、函馆公园、太极殿、东照宫、动物园、水族馆、里见泷等景点、胜地，在早稻田大学参观我国留学生行始业式，与云南留日学生聚会、畅谈留学感悟、共商聘教习、购书器事，并聚餐、留影等。

三 《日记》的史料价值

该书提供了大量晚清时期云南留日学界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这一时期云南的社会变迁、中国边疆官吏和云南地方政府对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态度与看法、云南留日学生及陈荣昌个人思想认识的转变等问题具有较为重要的

① 张维：《袁嘉谷传》第130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史料价值和参考价值。

第一，《日记》客观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云南社会的真实情况。陈氏在日本，时时比，事事比，似乎每一事物都能让他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反映出当时中国与日本、与世界的差距之大，从而开阔了乡人的眼界，激发了他们振兴桑梓、壮大国威的信心和决心。

例如教育方面。从教育精神来看，七月初一日陈荣昌到九段坂参观，听说九段上坂之游就馆陈列了许多战利品，我国叶志超三军司命大纛、北洋海军学堂榜额上署傅相肃毅伯衔名及各种军需品俱在，令陈氏“不忍往睹”，叹曰：“吾闻俄舰之败入上海者八艘，其军士仍常操演，且将败绩之事编为军歌，藉国耻以励众心，其报仇之志，未尝一日忘。故日人亦将十年之后俄必报仇之意编入教科书中，以资激励，则日人防患之心亦极周密。独吾中国夙多忌讳，不敢以国耻编入课本，教育精神因之不振。噫，忌讳太多，使国民不知时局之危，爱国忠君之念何自生哉？故精神教育当以国耻编入课本为第一要义。”从师生关系来看，八月初七日陈氏等人至有马小学校，参观学生游戏体操及唱歌音乐。陈氏认为，这所学校颇得《史记》提倡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旨趣。只见课间休息时，学生和老师都到操场运动，“其小学生之于师，有坠其肩者，抱其腰者，曳其手足者，师亦听之，且更诱之，而学生与学生之跳闹欢呼，更不待言。所谓儿戏，漫无规矩矣，弛之甚也。及一闻铃声，跳闹欢呼陡然止息，各就行列，行列既成，以风琴节之，各师导学生归讲堂，严肃整齐，如军人之走阵，张之至也。”陈氏感叹到：“吾国

教法，有张无弛，及出学堂游戏，则师不与焉，失之远矣。前夕佐佐氏谓：‘观游戏时师与学生皆在，而学生与师甚狎者，乃教师之善者也。’此言最有体验，然非亲睹其跳斗欢呼而闻铃即止之状，鲜不讶其言之太过矣。”从社会各界人士对学校的关注来说，日本“无事非学，无物非学，无时非学，无处非学”。就农学而言，无论从军战士还是出使他国的使者，都将接触到的植物、昆虫、高粱籽寄回国，以备学校教学试验之需，令陈氏大生感叹：“吾中国兴学，学校以内之人且不能使之皆注意于学，况学校以外之人？且远在海外，与教育无关之人乎？噫，办学校决不当徒求之学校，学校以外更有事在，予乃今日始知之。”

实业方面，七月二十三日陈荣昌至瓦斯陈列场，看到凡居家所需火力之处，皆可以用煤气代替，“其器数十百种，不能枚举，皆极便于日用”，可见“煤气之为功大矣”，因而叹曰：“吾滇矿产煤铁甚富，弃宝于地，不自采取，他人我先，利将尽矣。此宜先讲矿学，而制造之法亦不可不急求者。”又如九月初十日在筑地印刷所，陈氏认为“中国实业无进步者，以读书人鄙夷不屑为耳。外国实业蒸蒸日上，其师皆博士、学士或高等卒业之人，其徒弟皆小学卒业之人，故能推陈出新，以求精进”，而“吾滇实业尤待振兴，今师范生肯躬亲习之，甚可喜也”为学生愿意学习艰深的矿学，开发家乡矿产而感到高兴。又如七月初九日陈氏在足尾矿业所参观，从采矿到冶炼出金属，再到该矿业所收益甚丰，陈氏感叹说：“非先讲矿学，断无幸获者。吾滇矿山徒有而矿学不兴，即使集股开

采而毫无把握，亦所谓掷黄金于虚牝者也。……欲兴矿业，仍望学生中有实力讲求矿学者，回国之后，尽其所长以兴矿业，庶有济乎。”

在生活作风方面，日本人尚勤俭，而报国则极其慷慨。如陈荣昌赴日途中，与北海道厅龙冈氏和一起赴桦太任所者相遇，见他们“皆孑身孤往，无仆从，车中自购饮食，与平民等”，可以“提一鞵，行万里，无所碍难”，“故俸虽薄而亦能廉洁自守”，联想到“我国无论大小官，履任者皆舆从塞途，俸非加厚而用不能节”，叹曰：“无怪坐脏者比比。”又如八月十七日陈氏到两国桥观大游泳时，说：“日本大会其待来宾，只具茶果，俭约可风。吾滇每有会事，演戏设席，达旦连宵，而会事又大都无益，可为痛戒。”又如八月二十七日至共立女子学校参观，陈氏看到校规中有“戒女子装饰”一条，大致是说，近来女子服装渐趋奢华，争新竞美，少年女子，绮罗长袖，于体育活动有碍，学校本着“节约”、“涵养女子之美风”的原则，制定了学生衣饰的统一标准，陈氏因而叹到：“日本衣料皆能自织，尚力求俭约，以奢华为戒。吾滇皆不能自织，近复习奢，可忧甚矣。此亦父兄诸彦所当参考。”又如陈氏曾听好友袁嘉谷说，他到日本人儿玉春三家作客，儿玉之母“勤俭过于寻常，为客具食，只一汤一饭”，陈氏今与儿玉春三同游，感其生在富豪之家而毫无纨绔气习，循循规矩，勤而好学，因而叹曰：“盖日人居家，无不勤俭者，而报国则极其慷慨，成为风气，故日俄之战，其国中妇孺，数钱之积亦出以济军，此其所以兴盛也。尚武之风，固日本旧习，而人人知爱国，则以教育

普及之故。”

第二，云南官绅将日本视为“宝山”、“仙山”^①，对派遣学生赴日留学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同时对留日学生寄予了厚望。云南官绅对日本及派遣留日学生的这一态度在过去的史料和研究中几乎没有直接的反映。因此，《日记》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重要的补充作用。陈荣昌认为，近代以前，日本文明实来自中国，甲午海战前三十年，中、日两国同时派遣学生出洋留学，但甲午一役，检验出“日本维新之力而中国维新之不力”，而“中国振弱之机在于兴学”。在乡人眼中，日本维新有成，是蕴藏着各种足以济世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改革妙计、良方的“宝山”、“仙山”。“智者生存，愚者死亡，理固然也”已成为云南官绅的共识。因此，云南巡抚丁振铎说：“国家所以培植学生者，望学生学成后为国家效用耳”，“转望其（按：日本）文明输入中国”，云南派学生留学日本就是向日本“寻宝”、“采药”，医治中国之顽疾。为达此目的，治滇大吏不顾云南之边瘠，筹措巨资派学生留日，并为他们能在日本好好学习竭力创造条件。^②滇吏对留日学生学成后归国效力寄予了厚望。陈氏赴日前，云南巡抚丁振铎、云南布政使陈灿和曾为滇督、时任贵州巡抚的林绍年都托陈氏转达他们寄谕学生之语。丁振铎说：“云南

①（近）陈荣昌：《虚斋诗稿》卷10《东游集》第4页。

② 例如，陈荣昌看到留学生因无医药专款而“万里海外，困卧一室”，惻隐之心油然而生，听取留学生监督袁嘉谷“宜岁储千金以备此费”的建议，决定回滇后与滇吏商量此事，说：“荣昌念滇中大吏既筹巨万，送诸生出洋求学，岂复惜千金，不以卫其生乎？归当与岷师谋之。”